

史學研究論文叢刊
中國歷史學會主編

胡志佳撰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與中央之關係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胡志佳撰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
與中央之關係

圖書館藏
工業學院圖書章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初版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與中央之關係 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四角正

撰 者 胡 志 佳

主 編 者 中 國 歷 史 學 會

發 行 人 朱 建 民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印 刷 及
發 行 所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登 記 證：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八 三 六 號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三 十 七 號

校對人：陳寬剛 黃伯勤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的形勢	七
第一節	地理環境與交通網	七
第二節	州郡規劃及其重要性	一六
第三節	民族分佈	二三
第四節	傳統信仰	三三
第三章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的動亂	五七
第一節	地方官吏	五九
第二節	豪族與宗教	七五
第三節	少數民族	七九
第四節	流民	八四
第四章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的地方行政	一〇五
第一節	州郡區劃及其限制	一〇五

第二節 地方行政與亂事處理·····	一〇八
--------------------	-----

第三節 地方官及其職權·····	一一五
------------------	-----

第五章 結論·····	一三九
-------------	-----

附 錄

表一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叛亂事件表·····	一四二
-----------------------	-----

表二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官吏表·····	一五六
---------------------	-----

圖一 西南地區地理形勢圖·····	二〇〇
-------------------	-----

圖二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梁、益、寧三州沿革圖·····	二〇一
----------------------------	-----

圖三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交通路線圖·····	二〇二
-----------------------	-----

圖四 漢晉時期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分佈圖·····	二〇三
-------------------------	-----

參考及引用書目·····	二〇四
--------------	-----

第一章 緒論

三國時期蜀漢統治下富庶完固的西南地區，隨著司馬氏的代魏滅吳，再度納入晉版圖之中。西晉初年，由於天下初定，中央對帝國境內各地的控制力猶能普及，西南地區亦以一般郡縣的地位納入統治。只是西南一帶地理位置僻遠，交通亦不便利，與中原地區的聯繫仍屬不易。特別是惠帝以後，政治日漸敗壞，兵燹四起，社會動盪不安，晉室爲了維繫與西南地區的關係，在政策上做了一些調整，然而這些努力往往成效不彰。究其實，這與晉室對西南地區的基本態度有很大的關係，這是本書所探討的主題之一。

秦以巴蜀，劉備亦欲以巴蜀漢中取天下，至西晉初年仍藉蜀平吳；爲何到了東晉以後，蜀之富庶依然，卻無法成爲東晉的後援基地，反而因時起的叛亂，中央經常要遣軍平亂？此爲本書所探討的主題之二。再者，西南一帶地形的封閉完固，自始至終影響著當地歷史的發展；更因內部交通的便利，使其對外隔絕的特色更爲突出。結果晉室對此區的控制，往往須借助當地豪族的力量，造成地方勢力更進一步的擴大。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的動亂頻頻，與地方勢力的強大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而何以如此？這是本書想探討的另一主題。

一般而言，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聯繫，在政治局勢穩定的時期，一切都正常發展；而地方亂事的發生，或多或少顯示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出現裂縫。就史書而言，承平時對西南地區的記載較少，所載多

以叛亂爆發與弭平亂事的經過為主，透過這些非正常運作下所產生的動亂問題，進而了解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社會的發展，及其與晉室的關係，是本書的第四個主題。

從兩晉對西南地區的統治來看，其控制的方式，隨著中央政局的變動與都城的南移，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例如梁州，在西晉時因晉的控制力較強，其地位並不特別重要，僅居關中進入巴蜀的交通樞紐地位；然而東晉以後，政權南遷，北方外族日逼，梁州成為荆、揚等重鎮的外圍防線，使晉亦改變對梁州的控制方式，或由益制梁，或由梁制益，或總統於荊州都督區轄下。至於遠在益州之南的寧州，由於交通更為不便，以及當地主要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晉對此區的控制一直有鞭長莫及之感，羈縻政策顯然是主要的統治方式。探討兩晉時期對西南一帶統治手段的變革，亦為本書的主題之一。

論到統治手段，自然涉及地方官吏的問題，從兩晉時期地方官吏職權的運作，亦可略窺晉室對西南統治政策的部分。首先，因時代的變動與政治形勢的要求，都督區的地位日漸重要；而因地理形勢、權力均衡的考慮，西南地區大半時間皆劃屬荊州都督區，這種上下隸屬的緊密與否，與荊州都督權力的大小有直接的關係。再者，漢、晉以來，除以都督總轄軍事外，刺史在地方上亦兼掌民政、軍政；為了應付動亂的局面，東晉南朝以後，由本地人出任州刺史的情形日漸普遍，西南地區尤其是寧州，此一現象更為明顯，愈至後期，更出現類似「世襲式」的家族統治方式，例如尋陽周氏、陽武毛氏這些世居西南的大族，世代掌握地方政權。何以中央會容許這種地方世襲政權出現？此一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與影響如何？亦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

由於兩晉南北朝時期，政治的訊息變動遠大過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在目前區域研究的範疇裏，今

人所關切的多偏重與政治有直接關係的地區，如劉淑芬對東晉以後南方政權中心所在地的建康地區，有所剖析；黃淑梅的研究則以六朝時期太湖流域的發展爲主；相形之下，對於位處荊、揚上游的西南地區則較爲人所忽略。

三國時期因蜀漢立國於此，加上諸葛亮等人的努力建設，使西南地區的開發達高峯，後世對西南地區的研究成果，也多集中在蜀漢時期，對於三國前後西南地區的發展及其與中央的關係，研究無幾；或有提及，也多偏重史實的陳述，似未能深入分析。

近劉琳等人，將〔華陽國志〕這一部記載公元四世紀中葉以前西南地區發展的史籍，徵引多部晉以後的史書、地理書籍與考古資料等，重新加以考證、校注、標點，提供了更多有關西晉以後至東晉穆帝永和三年（三四七年）平定成漢之亂前後，西南的歷史、地理、人物等各方面的資料。袁英光、劉寅生等以朱謀瑋注〔水經注箋〕爲底本，將王國維所校勘的〔水經注〕重新標點整理，對於研究中古時期區域地理的發展，助益極大，解決了不少問題，爲本書提供不少幫助。此外，趙呂甫將保存最詳備、最有參考價值的南詔史料〔雲南志〕（蠻書）重新校注補充，書末附錄「樊綽所輯有關廩君蠻史料」提供不少研究南詔以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發展的資料。

專門研究兩晉時期西南地區歷史發展的論著，至今仍不多見。對於兩晉前後則有一些相關的論著：如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呈現遠古至秦漢大一統帝國建立爲止，西南地區發展的一般情況及其與中原文化接觸的結果；蕭璿〔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一書，以大一統的觀念及經濟因素爲前提，申述了中原政權對南方各地區開發的一般與特殊政策，而這些政策或多或少爲兩漢以後的王朝所沿用；耿立群

〔蜀漢對西南的統治與開發〕一文，將三國時代蜀漢對西南地區開發的新貌，重新披露出來，全文尤重於蜀漢政權建立的基礎，及其為維持政權存續所作的努力；日人宮川尚志在其〔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中，以〔華陽國志〕所列的地方豪族大姓為基礎，分析漢、晉之際西南地區地方勢力的發展，尤其突顯豪族經濟力與政權之間的關係，說明了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社會發展的特色之一。這些相關的論著，提供不少有關兩晉以前西南地區發展的資料，皆為本書探討之背景，也大致強調了西南地區的開發、發展，及其與中原政權的密切關係，而鮮及於因地形的封閉完固造成西南地區社會發展的特殊面貌。

有關西南少數民族的專門論著亦相當有限，尤中〔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一書，對於漢、晉之間，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分佈，遷移錯居及與漢文化交融的情形，有深刻的分析，討論時代自先秦至明、清，引用不少考古資料；近年，李昆聲、祁慶富合著〔南詔史話〕，藉著最新考古資料的輔助，分析南詔國政治、社會、種族、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對於唐以前西南地區的形勢，有深入的描述。此外，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與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二書，亦探討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活動概況，惟其內容皆著重南詔、大理時期的發展，對於南詔建國以前，雲南的昆明、大理等文化與民族發展，僅略為提及，但這些專門論著，亦提供本書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發展的一些條理。

此外，傅樂成在其「荊州與六朝政局」一文中，雖點出益州（即西南地區）對荊州地位的重要性，揭露荊州亟欲納益州為勢力範圍的梗概，但其主要論點仍集中在荊州地區，對益州的問題多略而不談；唐長孺「范長生與巴氏據蜀的關係」一文，考證范氏的族種，繼而剖析與李雄結合的原因，全文顯現了漢、晉時期西南少數民族發展的情形，自其分析可看出兩晉西南地區民族之間的融合已深，部分地區漢、夷之分

日混，如范長生等人已漸分辨不出是夷或漢了，但由於資料的侷限，只能作一推論；朱大渭主編《中國農民戰爭史》（魏晉南北朝卷），以農民起義的角度，敘述西晉末年六郡流民在西南地區的發展；黃繁光「成漢的興亡」一文，以個案研究方式，分析成漢勢力建立的經過及其失敗覆亡的原因，對於成漢佔據西南時期歷史的發展有詳細的陳述，但對於成漢達成其割據的根本原因，似未能深究。

至於有關西南民族研究的論文為數不少，如饒宗頤「西南文化」一文，將秦漢以前史書中，有關西南諸民族的資料抽離出來，加以編排敘述；章冠英在其「兩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變動中的廩君蠻」，對於巴地少數民族之一的「廩君蠻」在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與遷移有所說明；芮逸夫亦曾對西南民族有相當深入的考證，如「僚人考」、「獐人考」、「古代苗人考」等文，桑秀雲亦有「邛都、笮都、冉駹等夷人的族屬及遷徙情形」，這些論文皆各有所重，但對於瞭解整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分佈、發展與遷移路線，或多或少提供貢獻。

相關論文方面，毛漢光先生的「五朝軍權的轉移」強調了東晉以後中央政權的衰竭，與地方勢力的日漸勃興，並探討其於地方政治運作中的地位；日人窪添慶文的「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地方支配と豪族——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問題について」，分析魏晉南北朝以來，為因應紛亂局勢，所不得不採行的對應措施。這些論點雖著重全局，但對本書分析西南地區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方面，提供不少助益。

本書主要以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的叛亂問題為中心，首先藉其發生的背景與性質，分析晉對西南的一般態度，以及地形的侷限與社會勢力、地域觀念的相互關係。繼而由亂事發生後晉室的處理態度，比較兩晉時期在一般政策、都督區的設置，以及官吏職權運作等方面的不同。最後從地形限制，叛亂緣起與晉的國

力強弱，以探討兩晉在處理西南問題時所面臨的困難、對策與結果，以及西南地區對中央的態度。

本書撰寫期間，資料蒐集，倍感困難，加以本書研究範圍又屬地僻一隅的西南地區，史料的掌握更為不易，時人的研究成果亦極有限，尤其在少數民族問題方面，更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藉著零散、有限的史料，透過對叛亂的分析，或可略窺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的發展及其與中央的關係，俾補以往研究的空白與不足。疏漏舛誤之處，自所難免，敬祈學者方家不吝指正，以爲進一步研究改訂。

附錄一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與中央之關係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與中央之關係，可分兩方面來考察：一、兩晉時期西南地區對中央之態度；二、兩晉時期中央對西南地區之政策。前者可從兩晉時期西南地區之叛亂與鎮壓，以及西南地區之歸附與開發，來考察西南地區對中央之態度；後者可從兩晉時期中央對西南地區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政策，來考察中央對西南地區之政策。兩晉時期西南地區對中央之態度，可分兩方面來考察：一、叛亂與鎮壓；二、歸附與開發。叛亂與鎮壓，可分兩方面來考察：一、叛亂之原因；二、鎮壓之經過。歸附與開發，可分兩方面來考察：一、歸附之原因；二、開發之經過。兩晉時期中央對西南地區之政策，可分兩方面來考察：一、軍事政策；二、政治、經濟、文化政策。軍事政策，可分兩方面來考察：一、軍事之目的；二、軍事之經過。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可分兩方面來考察：一、政治、經濟、文化之目的；二、政治、經濟、文化之經過。

第二章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的形勢

第一節 地理環境與交通網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從漢晉南北朝以來，樂府詩中許多題爲「蜀道難」詩的描述，（註一）一直到最爲人傳誦大唐詩人李白的一首「蜀道難」，道盡了西南地區地勢的險要與崎嶇。

在地形上，西南地區除成都、宜賓一帶是低於海拔五百公尺以下的平地及平原帶外，其他多爲盆地或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地高原區。其四周亦爲連綿不絕的高大山脈所屏障，與外界隔絕；西以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邛崃山、青康藏高原與今青海、西康爲界；北以秦嶺、大巴山與中原地區相隔；東則以巫山爲屏障，與荆襄相離。此一區域除了西北山區金沙江、雅魯藏布江與大渡河等大河穿裂山脈所造成的峽谷較不適合居住外，在河流的交會點、沖積地以及較低的山區平地，大都土地肥沃，物產豐饒，人口往往滙聚在這些地區。魏晉時期對這一情況的記載，史不絕書，如〔水經注〕引〔益州記〕云：

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謂之天府。（註二）
又如〔華陽國志〕記載濱臨涪江的涪縣：

有山原田，本稻田。孱水出孱山，其源出金銀礦，洗取，火融合之爲金銀。陽泉出石丹。（註三）在此一封閉區域之內，又可分爲南北二部。北爲一完整的盆地（今四川盆地），盆地之中又爲山脈與河流所分割，西北有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註四）縱貫於盆地西部，中央則以劍門山分盆地爲巴、蜀二地；除山脈的縱列外，密佈的河川如岷江、雒江、涪江、嘉陵江、巴江、瀘水、大渡河等，其間交錯無數的小水道，構成天然水運網，（註五）便利了盆地內的交通。盆地之南則爲一大片高原區，較大的山脈有玉龍山、高黎貢山、點蒼山、大婁山等，亦呈縱貫式排列；大河則有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烏江及南、北盤江，河道多湍急洄悍，難以行舟，往來多依賴陸道或大江的分流小道，交通情況較爲不便。

對外交通方面，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的對外交通，大多經由北面的山路、或東方的水道及沿長江的陸道，由於諸道的艱險難行，更顯現其易守難攻的形勢。在晉室尚未南渡之前，西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的關係猶稱緊密，其時彼此的聯繫多以北方諸陸道爲主，其中又以自沔縣向西南經劍門山入蜀的道路最爲重要，此即先秦秦惠王入蜀之路：

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註六）

「石牛道」自開鑿後，成爲秦漢以降由關中入蜀的主要道路，至隋文帝時，以「巴蜀阻險，人好爲亂」，於是「更開平道，毀劍閣之路」，（註七）此後日漸頹廢，而爲新的驛道幹線所取代。（註八）

另一對外交通要道，爲「石牛道」以東，自南鄭南行，循山而入巴地的「米倉道」。（註九）〔玉堂

閒話〕曾描述此道之艱險云：

路由興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徑鳥道。路眠野宿。杜絕人煙。鸛獸成群。食叫行旅。（註一〇）

由於路途高險難行，禽獸逼人，加以李雄亂後，巴中一帶荒蕪不堪，多為夷獠所佔，（註一一）利用價值日減，要到南北朝及隋唐重新開鑿修建後，才成為官商通行的要道。（註一二）

在北方諸道裏，尚有著名的「陰平道」。晉以前陰平道已有正道與偏道之別，正道由陰平郡東循白水，至橋頭（白水、羌水會合處），東南行至白水縣關與漢中西南經陽平關、渡嘉陵江入蜀之道會合，即陰平正道，為南北朝時期各勢力爭取仇池、武都、陰平山區控制權的用兵主線；（註一三）而由橋頭東南行至景谷（今白水街西北）折向西南斜出，經德陽亭至江油入蜀為偏道，〔魏書〕「鄧艾傳」載：

（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列陳待艾。（註一四）

此道原為應軍需而臨時鑿建，但因鄧艾的出奇致勝，反較正道為後人所矚目。

至於大巴嶺以東地區，兩晉時期原有自長安南下，經子午道，過漢陰縣沿任河河谷達巴、蜀之道，晉室東遷後，形成南北對峙之局，此區在聯繫南北的功能上減低很多，不加修治，道路逐漸廢塞。對東晉政權而言，較重要的道路反而是聯繫襄陽與西城間東西向的路線，此為東晉以後，北方外族南下侵擾漢中時，晉廷反擊的路線之一，如穆帝永和十年（三五四年）二月，桓溫統軍大舉北伐，「統步騎四萬發江陵，

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註一五）唯此區因山水深阻，重巒疊嶂，甚至到唐統一後，大力開發，設置傳館以利通行後，猶感行旅維艱。（註一六）

兩晉時期西南地區另一對外交通要道，爲東西走向的長江水道。西晉時，西南地區與中原物資流通與文化傳播，多以北方諸道與長江水道交互運用，而北方諸道的使用價值較高；但在晉室東遷，北方爲外族盤據後，與晉室的聯繫，大都轉而仰賴成都、江陵間的水陸道。此區西南境爲長江最東段，切割群山而下，蔚爲奇觀，而不利行道。歷來對三峽險惡之描述不勝枚舉，如唐人李肇云：

蜀之三峽，河之三門，南越之惡谿，南康之贛石，皆險絕之所。……峽路峻急，故曰朝發白帝，暮徹江陵，四月五月尤險時。……舊語曰：五月下峽，死而不弔。（註一七）

順江而下已是極險，何況是逆流而上，因此由荆、襄入巴蜀者，多沿江谷道循陸路而行。此區又因節氣影響，春秋時節，霖雨頻降，又以沿途盡爲高山深谷，毒蟲瘴癘深佈其中，陸路亦感難行，唐代元稹「蟲」詩序猶云：

巴山谷間，春秋常雨，自五、六月至八、九月，雨則多蟲，道路群飛，噬馬牛血及蹄角，且暮尤極繁多。人常用日中時趣程，逮雪霜而後盡。（註一八）

東段江路之難行，於此可見一斑。但卻是東晉以後，荆、揚與西南地區聯繫的主要道路，尤其是在西南發生變亂時，東晉政權救平亂事所經常使用的要道。

長江水道自江陵逆流而上，過三峽之險西向而至萬縣，江流南曲呈弓形，迂迴迤邐，由萬縣至成都之捷徑則多取直西弦線。但此道因多穿山越嶺，不便於貨物轉運，大抵爲客旅所用，貨物仍由水路運輸，宋

代范成大「吳船錄」即記載：

（萬縣）在江濱，邑里最爲蕭條，……然泝江入蜀者至此即捨舟而徒，不兩旬可至成都，舟行即須十旬。（註一九）

經過萬縣一帶迂迴的水道後，由此至成都之間地勢漸趨平坦，可利舟船，而交織輻輳、往來便捷的水陸交通網，使得成都成爲西南地區的第一大都市。

西南地區的對外交通，除了北以山道與中原聯繫，東以江道與荆、揚交通外，南則以漢、晉時期的「滇越道」與外界往來。此道開鑿早在東漢以前，由賁古東南沿葉榆水（今龍盤江），過進桑關、靡冷縣可達交趾，（水經注）「葉榆水」條載：

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時在交趾）上言：從靡冷出賁古，繫益州，臣所將越駱萬餘人，便習戰鬪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往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註二〇）

從晉初交州牧陶璜上言：「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交通，互相維衛」的情形來看，（註二一）大致晉時此路仍保暢通。〔華陽國志〕亦載西晉後期，梁、益州爲流民騷動，道路阻絕之際，洛陽與寧州之間的交通，亦多繞經交州而上：

光熙元年春三月，（寧州刺史李）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牂柯，路塞，停住交州。……首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註二二）而「滇越道」自西隨至交趾「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註二三）及從前引李釗旅程「首尾三年」的記載，可知亦頗爲難行。

由於交通困難，交通孔道沿線的諸城，遂成爲維繫西南地區安全的重鎮。北方諸道是中原地區通往成都最捷近的路線，沿線的梓潼、縣陽、德陽、雒縣等城，成爲防禦成都安全的前哨站。因此西晉時期，由成都以北而起的動亂，往往先佔據這些交通要地，作爲入侵或防衛成都的憑藉。惠帝永康元年（三〇〇年），益州刺史趙廋見天下大亂，欲謀據益州自立，晉令梁州刺史羅尚率軍入益平亂，趙廋遣將督萬餘人屯縣竹之石亭，截斷中原入成都之道路，以遏阻晉軍前進；（註二四）而後李氏等流民亂蜀，亦先據縣竹等地以與晉軍相抗，由此先下廣漢，再揮兵攻打成都，（註二五）晉河間王顥亦遣其督護衙博，自長安南下入蜀，駐軍於梓潼，與護守德陽的廣漢太守張微及於繁城防守的益州督護張龜等，於成都之北佈成一防禦圈，以抵擋李氏流民的進攻。（註二六）

北方沿道要鎮由於戰略地位的重要，西晉時期每當益州動亂發生時，往往率先陷入兩方爭奪的戰亂之中；而至晉室南渡後，發生顯著改變。由於晉移都江南，與西南地區聯繫的主要路線，一反過去的南北道，轉而依賴成都江陵間的長江水陸道。東晉時期，每當西南地區發生亂事時，沿江的各個重要城鎮常淪爲晉廷與亂軍爭奪的戰場。如安帝義熙元年（四〇五年）巴西南充人譙縱率衆反於蜀，以其弟明子「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註二七）稍後義熙三年（四〇七年）劉裕遣劉敬宣伐譙縱，即由墊江而進。（註二八）早在穆帝永和三年（三四七年）桓溫滅成漢後，鑑於戰亂時中央由江陵而來的援軍必經這些地區，以及亂軍多先佔領沿江地區以阻止晉軍的救援，因而將原屬梁州而有長江水道流經的巴、巴東、涪陵等郡縣，劃歸益州，俾能有效的掌握這條重要交通路線，而由益州刺史總其成，以便亂事發生時的調兵遣將，使成都都不致陷於絕地。至劉宋政權建立後，更於此設置三巴校尉，控扼三峽之險。（註二九）